

經濟的帝國主義

石光澤譯

上海
北新書局

1929



社會科學叢書之一

經濟的帝國主義

烏而夫 著
石光落 譯

上海

北新書局發行

1929

勞意喬治 (Lloyd George) 序

以『中國之謎』名這本講遠東複雜政局的書，頗爲精當，但是蘭孫姆生動的文字真能使我們洞徹此中的玄奧。蘭孫姆先生觀察最爲銳敏，而他給我們一些暗示于許多想解決這猜謎的人，甚有裨補。

在英國，我們只能如同在樓座末排的觀客，由遠地觀察中國的政劇。這齣劇的地點遙遠，情節複雜，人物又有奇異難記的名姓；自然難免我們的精神時要疲懈，劇中來來往往的東征北伐，攜手，倒戈，閑談，惡罵，種種動作，由歐洲看來，是沒有多大的意義。忽然間戰雲瀰漫，喇叭吹鳴，報界議論沸騰，說我們的切身利益要被侵害了，非犧牲一切去保護不可。我們現在還有幾千英兵駐紮上海，退出時間還是遙遙無期。這是什麼一回事呢！我們都應該想知道，應該去理解。

我們不能強迫中國來同我們貿易，所以我們應當與她爲友。但要同她爲友，必先滌除那些治外法權所給與她的恥辱，這些恥辱她已經決心要滌除蕩盡，與在先的日本，土耳其相同。

中國的國民革命根本上是合理的主張。如果他們的領袖缺少經驗，有時候能力不足以制裁民衆，我們或者暫時不得不假借武力，來保護我們的權利，以待政策恢復穩健的時期。但是我們無論如何，絕不可與人以敵視國民黨的印象。我們可以引赫德 (Sir Robert Hart) 的話；他是最熟審中國者之一，是前拳匪時代的北京總稅務司，所以最不會過譽中國民性的人：——

『我們所要的是我們的百姓能安居中國，我們的權利能受妥實保護，跟在他國一樣。推根究底，除非我們待中國及中國人如同待任何文明國及其國民，——比如說，美國，及美國人——一樣，這一層不能辦到。這樣的補綴彌縫，是不濟事的；我們須重製一套新服。現在有國際間的癰疽發作；在他發作期

間，總會刺激，劇痛；如果要建造互相親善同臻強盛的基礎，如果要享受國際的健康，非先把這癰疽根本割除不可。」（見 *The Land of Sinim* 頁一二九）。赫德氏這些話到現在還是適用的。我們的利益與中國的利害是相同的。兩國都要和平，都要貿易。如果我們還是繼續的互相惡罵，互相挑撥，結果必使和平與貿易，一樣都得不到。

據我所知，這是蘭孫姆氏在這書上的主張，我覺得英人了解這個主張是極端的重要。

D. Lloyd George 15, 3, 1927.

經濟的帝國主義

目 錄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在非洲	二五
第一章	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在亞洲	五九
第四章	因與果	八三

第一章 導言

本書的宗旨在說明歐洲諸國對於亞洲非洲未發達的諸國之關係。我們個人，對於現代一種「時運」，是旁觀者同時又是關係者——這種「時運」對於我們的生活以及非亞二洲人民的生活是有着最深切的影響的。凡屬世界上重大的「時運」——如基督教運動，封建主義（Feudalism），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以及本書所要研究的那些現象——在一個平常人看來，似乎完全是非人力之所能轉移，尤其是對於同一時代的事。他覺得世界上種種「時運」，彷彿是由于自然的一種大力，是無可奈何的，一如地震之發生，颶風之勃起，四時之代序。這種「歷史的宿命觀」，（Fatalistic view of History）對於許多人，對於許多歷史家，雖足以自慰，但究竟是一種謬見。本來人類之征服自然界和禽獸已經有了這樣的成功：人類的歷史現在是很

少受它們的影響了。過去的二千五百年中，人類的歷史大都是由人類自身所決定，由于種種信仰，由于種種願望。如果不是因爲有些人信仰並願望某種事物，則將沒有基督教徒，沒有基督教；如果不是因爲另外有些人信仰並願望別的事物，則初期的基督教徒便不受迫害；而且基督教之所以不能造成一個基督教的世界者，即因爲別方面的信仰與願望壓倒了這方面的信仰與願望故也。把歐洲縛住在封建制度的鐵鍊裏以至數百年之久者，不是上帝，亦不是國王；蓋封建主義之產生乃由於當時地主和農奴所抱的思想，由這種思想所發生的重大影響却被所謂歷史的這種浪漫故事弄得模糊了。釀成前次的世界大戰者，不是那「凱撒」（德皇），亦不是其他「戰爭罪人」，而是德，法，英諸國中數千萬男女們，他們都閱看本國的報紙，而那些報紙說是的，他們便以爲是，那樣報紙說要怎樣，他們便要怎樣。

在十九世紀中，歐洲人與非歐洲人之間的關係，歐洲文化與非歐洲文化之間的關係，是起了這樣深微的一種變化：這些改變竟形成了一種「時運」，其影響之

深，其影響之廣，其影響之烈，實不亞於基督教或封建制度。只要把一八〇〇年的世界和一九〇〇年的世界一比較，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出這些重大的改變之主要的性質。在一八〇〇年，歐洲以外的世界，有些部分多少是被「歐化」了（即「化爲歐洲的」或「化爲歐洲樣」之意）了，但是各地方各民族，很少處於歐洲諸國的管理之下者，而且很少遭受強迫的「歐化」者。現在呢，就是那些未被「歐化」的地方也都是公開地或祕密地受歐洲的支配了。我們且將這一世紀中的變遷加以更切近的考察罷。一百年前，美洲大陸是有幾分被「歐化」了，因為最初受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征服，其後是受了法國和英國的侵略，那時歐洲人不曾深入非洲內地；歐洲諸國在亞洲大陸也沒有穩固的根據地，不過英國的商務公司已創立於印度，而且荷蘭，葡萄牙，法蘭西諸國也還有些小小的屬地在那裏；太平洋和澳大利亞並沒有受歐洲人實力的支配。現在呢，北美洲的全部是完全被歐化了，南美洲亦大都被歐化；非洲則完全是被歐洲諸國所瓜分了，而且是直接地受它們的支配，只有亞比西尼亞

(Algeria) 和利白利亞 (Liberia) 這兩國勉強可以說是例外；在亞洲呢，則只有日本這一國可以說是完全獨立的，其他大部分都是被歐洲各國所瓜分或征服，而太平洋羣島也都作了歐洲諸國的屬地或殖民地了。

所以現在這種「時運」就是一種「歐化全世界」的運動。不過這裏有兩種方略。第一就是像我剛纔在上面所稱爲「歐化」的那樣辦。這在人類歷史中本是「古已有之」的一種現象。在這地球的面目上從來就有種種的民族潮水似的一漲一落，而在美洲，非洲，澳洲之「殖民地化」的進程中，我們便看出歷史中民族的漲落之近代的樣式。這種「殖民地化」開始也許不免要經過一番殺戮和征戰，但是最後總是造成了一種新的文物制度，根據本地的人情風俗，以治理本地的庶事。在美洲，南非洲（就有些地方說）以及太平洋羣島諸地，那些歐洲人，不是和本地人民混合了，便是自成一種新的獨立的社會，有獨特的文物法度。但在亞洲和非洲呢，却是別樣的一種方略，而本書所欲研究的就是這個。在非洲（除南非洲一小部分外）沒

有「殖民地化」，沒有人種之混合，亦沒有新的人口及新的文明之產生。那裏的土地和人民單是被歐洲諸國所征服，直接受它們的治理而已。在亞洲則有兩種不同的情形：在印度全部和中國的某些部分以及和中國接界的那些地方，歐洲人會直接地運用本國的勢力，如同在非洲一樣，使那些人民受歐洲的統治；但是在中國本部，在土耳其，在波斯，歐洲國家的勢力則是非直接地運用，那不是要獲得領土和對於人民的完全行政權，而是要更進地發展歐洲人民之經濟的利益。

在後文所要研究討論的就是這種二重方略之實行於非亞二洲。對於這方略的兩種形式，本來應當分別研究，但是在這裏讓我們更深刻地探究它們的一些共通性質。我們所要研究的那種現象其實就是在非亞二洲內的歐洲人對於非歐洲人的種種關係，而這種種關係即表現於歐洲諸國對付這兩洲的人民和政府的那種政策之中。這種政策的結果，使非洲的全部和亞洲的大部分（幾乎也可說是全部）處於歐洲諸國直接的或間接的支配之下：這是我們所知道的。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真正重要的問

題是：這種政策的動機，目的，和結果是什麼？——歐洲人及其政府是由於什麼動機而竭力使那些遠方的土地和人民受其支配？——這種支配權既確定了，則目的與結果又怎樣？本來個人的，民族的，國家的種種動機都是很複雜的；如果你說要找出一種單獨的簡單的原因以說明瓜分非洲，征服印度，侵略中國這種複雜的現象，那你便是「非愚即妄」。不過，歷史上許多事故和運動，雖則是由于種種原因所釀成，但是往往總有一個特殊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即可視之爲那些變動之真正的原動力。在過去的五十年中歐洲人施行於非亞二洲的那種政策，便是如此。這種政策的結果是非亞二洲爲歐洲列強所宰割，成爲它們的領土或屬地，或則成爲它們的勢力範圍了。也許這種情形不會有，如果歐洲人不是懷着若干信念和欲望。這些信念和欲望可分爲不同的四種：即道德上的，情感上的，軍事上的，和經濟上的。這幾種信念與欲望究竟各有何種作用以促成歐洲帝國主義的政策：這是我們所要研究的。

在帝國主義者的言辭和文字中常常發見關於帝國主義之道德性和責任心的那種思想：他們的意見以爲由歐洲人統治非亞二洲的人民并取得其土地，在道德上是正常而且必要。這種學說已歸納成了這樣的一個話頭：「白種人之任務」(The Whiteman's Burden)。依照這種歷史的和政治的見地，凡屬白種人，較之其他種族，其心胸和頭腦，尤其是政治的和社會的組織，以及道德，宗教，莫不「高人一等」。他們誠然是「上帝的選民」(God's Chosen People)。正如兩千年前之在迦南〔按即指古代自命爲「選民」的以色列人之故事〕，現在則是在非亞二洲，這班自命爲「選民」者以爲首先應當使世界上其他民族歸附他們，才能施與那種優越的文化之福澤。如果那些較卑下的民族是死守善道的不肯承認他們的地位而且不肯領受那種福澤，則他們便應當被克服，被殺戮，直到他們承認了上帝和征服者的法律時爲止。這種道德上的信念多少總參在帝國主義的學說和政策裏面：這是很明白的事實。但是我們應當明瞭這種信念到底是怎樣參進那裏面去的。本來，在十九世

紀中，道德的信念並不會爲帝國主義者之進取的動機或原動力。歐洲各國之征服或統治非亞二洲的人民和土地，並不是想給那班人民以歐洲的政治之福澤。即使是假仁假義罷，也沒有一個帝國主義者冠冕堂皇地說他的動機是要爲那班被征服的或被佔有的人民謀福利。每當得到了一些地方的時候，則其所以略取的理由不說是軍事上的，便說是經濟上的，或情感上的（這就是說要保持國威）。歐洲各國一向所做的是要（一）討伐那不屬於歐洲而且未受教化者，（二）保護那些已被征服已被管屬者而防止鄰近的那些未開化未被征服者之惡例，（三）爲了國旗之受侮辱而雪恥（這就是上面所說的情感上的一種信念，保持國威），或（四）保護或增進本國人民的經濟利益。然而那道德上的理由和信念却仍舊形成一種「正大光明」的空影子戴在帝國主義的頭上。雖則那時不復有人申言歐洲人之征服非亞二洲是爲那些地方的人民謀福利或是爲傳佈歐洲的文化宗教以及法律制度于那些地方的人民，但是，如果你要那班帝國主義者從那已經征服的國度中撤回手去或放棄那已經得到的土

地，則他們便以「爲那些歸附的民族謀福利」爲理由以反對之。現在并沒有人說法國之于突尼斯（在非洲北部）英國之于埃及或烏甘達（Uganda）（在非洲東部）是懷着博愛的動機；然而英國和法國之所以始終不肯實行放棄埃及和突尼斯者却老是藉口于「爲那些地方的人民謀福利」；而且當時英國軍隊爲着一個英國合資公司（Joint-stock Company）佔領烏甘達之後，便不肯再放棄，其主要的而且最有力的理由是：一經放棄，則對於烏甘達人民，對於基督教，對於英國商務，勢必蒙重大之損失云。所以，總括起來說，帝國主義和道德觀念之關係可以說是這樣的：歐洲人之佔取土地是由于自私的動機，而他們（至少是大多數）之保持他們已佔取的土地，則自以爲是博愛的動機了。所謂白種人之任務云者，只是在他們因一時發昏或爲貫滿錢袋子起見把那種任務放上自己的肩膀之後，于是那種任務才成了一種責任。

帝國主義一向總含着情感和意氣這兩種作用在裏面。每當戰事爆發，國內的人

民便如中風而走，這就是這種情感和意氣在那裏作怪；不過，如果戰事在很遠的地方進行，則我使不覺得那麼回事。近代各國之佔取土地，開始總是少數狂妄的進取者或客氣用事的軍人暗地裏進行，因為他們在歐洲各工業區域不能得志，却可以在非洲亞洲這些地方滿足他們一些慾望（這是就一九一四年以前的那個時期說——原註）。

但是，如果你以為這班客氣用事的進取者的意念就是近百年來歐洲帝國主義者之所以擴張領土的主要原因，那你可錯了。有些殖民地的長官或軍人，因為有那種進取的野心，往往拿出一種適宜的理由來為擴張領土的政策作護符，但是沒有那一國亦沒有那一個政治家曾經公然說要怎樣，或應該怎樣，在非亞二洲的領地內給那班進取心很盛的人民以一種「用武之地」者。對於帝國的政策有較大的影響者還是另一種情感上的信念，而且這種信念却很有重要的關係。我們試看法，英，德，意，各國中那班在朝的和在野的政治家之言論，和那班歷史家及公法學家之著作，則知他們表示了一種普遍而固執的信念：以為佔取而且保有歐洲外的屬地和附庸，足以表

現本國偉大的光榮。依照這種思想，則國家的聲威之大小視其征服「蠻夷」與否以爲斷。在事實上，歐洲民族不但以得到歐洲以外的土地爲國家增光，而且還覺得：如果別的國家得到了什麼土地，是足減損本國的光榮的。法國的國務總理曾經有過這種議論，說英國之佔取塞普羅斯島（在地中海）有損法國的聲威，于是只有佔取別的土地——如東京（在安南）或突尼斯，或二者兼而有之——才能恢復她的光榮。德國之佔取非洲西南部及其他殖民地，在英國的政治家和歷史家看來，不僅是對於英國的商務上和軍事上的一種打擊，而且是對於英國的聲威的一種損害哩。世界上這種現象和各國的這種心理，我們可以從社會上找出和類似的事情來。例如，某甲有了一幅繡花簾幕或一株「安斯辟第斯特那」（Antipathy）（想係一種珍貴的植物），或者有了一幅汽車或一個家人，那麼他在社會上的聲望亦隨之而增長；但是，更進一步來看罷：甲既有了這種東西，在乙看來便視爲對他的聲望有所侮辱了，因爲甲與乙本是同一等級的人，而乙卻沒有甲所有的那種東西也。但是，「佔